

主題 | 政治暴力創傷與轉型正義：療癒是否可能？

講師 | 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引言人 | 謝仕淵（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時間 | 2020年6月7日（日）下午 2:00-4:00

地點 |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C-Hub 成大創意基地三樓會議室

主辦單位 |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謝仕淵：歡迎大家來參與這次的演講，我們非常難得邀請到彭仁郁老師為我們分享關於轉型正義很重要，但從這幾年才開始覺得是一個必須面對的課題。成大的人社中心大概這兩年，一直對這些當代重要的人文社會議題的研討乃至於實踐，是我們這兩年一直在關注的問題。這次是跟多元文化中心一起合辦這次的活動。最主要的框架，是承繼我們去年到現在的當代社會議題，這個議題不僅僅是學理的討論，也是在尋找針對當代社會各種不同存在、不同課題，是否有更好的應對方法。

我對於這個議題的關注，約在二十年前，我們還跟著已故的張炎憲老師，跟他在訪問很多政治受難者跟他們的家屬。那時有一個很深的感觸，我們除了從他們身上能得到他們在記憶裡了解的過去之外，我們還能夠做什麼？因為通常這樣的訪談都很悲傷，我們雖然那個時候意識到創傷的問題，卻沒有專業可以處理。二十年前我在柯旗化老師家，那時候柯媽媽還在臺北的時候，她本身也是政治受難者，但是常常來她那邊的，還有比她更年輕一輩的政治受難者的第二代、地三代，我也在那時認識他們，也就是彭仁郁老師寫的文章裡看到的那些人。他們可能是第三代，但他們往往來自於童年、國高中曾經歷一段很特別的家庭經驗，成為一個網綁他們一輩子的東西。

我在二十年前認識不少這樣的人，但其實那都不是我的專業能夠解決的問題。二十年過去，轉型正義議題隨著這些檔案資料開放而逐漸清晰，有些課題是刻不容緩需要去面對的，也就是彭老師今天要談的有關政治方面的創傷跟轉型正義的問題，也就是今天彭老師要談的。彭老師到去年還是我們促轉會兼任委員，本質是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不過因為研究院有很多制度的關係，必須回到所內，但彭老師持續關注這個議題。我們以掌聲歡迎彭老師。

彭仁郁：大家好，今天謝謝你們願意來這裡。我有個非常奇怪的感受，臺灣整個社會氛圍，對於民主、國家，我們的集體、想像共同體要建立在什麼樣的價值上面？各位看起來很年輕，大概是解嚴後才出生的，和我們經歷不同。我們到高中的時候還在戒嚴時期，到大學才開始第一次接受到所謂的民主洗禮。在那之前，對我們來講，當然之前政體是民主的，但到底什麼什麼是真諦，什麼是自由人權？我一直到大學第一次知道台大以前有四六事件，第一次看到白色恐怖那四個字，突然有一種被打醒的感覺，可是那種「打」是很不舒服的。我常講自己 20 歲以前我都是中華民國人，中華民國人的價值就是在維護中華民國政體本身，雖然以人民為主，但重點是中華民國。我們也知道中華民國宣稱自己是自由民主憲政的政體，但實際上我們從小到青少年時期一直被教育的都是，我們最大的目標就是捍衛秋海棠，捍衛一個其實在概念上好像與我們乍看相近，但事實上很遙遠的一個「中國」的想像。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發現可能一直要到在成年之後，才開始去想我們的價值在哪裡，共同體又是建立在什麼樣的價值體系之上？我從進大學開始，碰撞到白色恐怖這樣的字眼跟場景，花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我才真正明白、才去碰觸這段活生生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們。

我是臺大心理系畢業的，也一直想要做臨床工作，可是在那個年代，心理系是從來不提政治暴力創傷。不要說在那個年代，一直到我回國，我發現學弟學妹們在各式各樣的心理系，而

不是只在科學、理學院的心理系，包括人文社會科學院的諮商輔導，雖然有這種臨床的心理學測驗，但都沒有提過政治暴力創傷，也不提引發的創傷效益，當然更沒有去想像臨床上面可能碰到這樣一群人。

這件事我覺得很匪夷所思，臺灣民主化理論上已經三十年了，為什麼在這過程中，我們的師長們從來沒想到要告訴我們社會經歷了嚴重的創傷事件，我們整個國家幾乎是半世紀都在黨的體制嚴密監控壓迫中，沒有人來提醒我們這種歷史創傷的真實是在社會、身邊，甚至某種程度在我們心理中。這件事一直要我從法國回來，真正開始接觸白色恐怖受難者、二二八受難者的後代們，我才真正開始去理解為什麼即使在專業領域裡面，我們基本上是避而不談的，我會逐步為大家揭露。

我們號稱 1987 年解嚴，但實際上，大家知道 1991 年還有最後一個政治壓迫事件獨台案，為什麼？因為刑法一百條一直要到 1992 年才正式被修訂，讓政府不能夠再以思想入罪。也就是說，過去就算你沒有做任何實際行動，只是你接觸某些人、看了某些書、發表一些言論，政府就可以推測你要推翻國家，甚至可以不顧大學自治，進入校園抓人。這是 1991 年發生事情，外島一直到 1992 年 11 月中才正式解嚴，時間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長遠。很多人可能以為臺灣是民主奇蹟，是亞洲民主人權的燈塔，我是覺得蠻誇張的。

先談談我一開始的訓練，是比較個人化、科學式的訓練，在臺大心理系是理學院，理學院的臨床訓練要去醫學院修大體解剖，要知道大腦組成、神經傳導路線還有大腦區塊等，但我發現，歷史面向跟社會面向在心理學系裡面是完全不被談及的。我很早就對創傷有興趣，在臺大精神科實習時，就特別想接觸看起來精神症狀嚴重的人，想知道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但那時發現臺灣精神醫學主流基本上是在 1980 年代以後，有一本精神學聖經叫 DSM（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由此書可知，精神疾病是統計來的，症狀要達到某個統計的顯著標準後，才會被指認成一種疾病，不是像武漢肺炎那樣，可以一篩出陰性或陽性。意思是說，其實精神醫學的科學性一直被挑戰，也因此，精神科醫生特別會在診斷、治療方向一直希望往大腦神經方向走。也就是說，我們在大學開始訓練臨床心理的時候，就一直要求要把人標準化、普世化，這種社會跟歷史的面向一直到非常後期才進到我們的事業裡面來。而且，當這些社會面向、文化面向進到臨床事業中，通常是被當作變向，而不是真正看人整體影響什麼，這對我來說非常吃虧。

我到法國唸書，開始做家內性侵的研究時，就發現法國的臨床性主流是精神分析。過去在大學學習分析裡的普通心理學、人格心理學，只對精神分析有粗淺介紹，我到法國才從頭開始念精神分析學，這個學科看待潛意識、看待慾望，不只是針對情感方面。我們常看兒童的狀態如何受親子關係影響，通常以為精神分析植入早期親子經驗，認為只有親子關係會影響人的狀態。到法國之後我發現，精神分析整體在對待人跟潛意識是哲學、人類學的，人文研究、任何學科都參雜在裡面，因為人的面向是不可以切割的。

這件事情在精神分析裡面是不能切割的，還好我在台大的時候，有位余德慧老師，很早就帶我們唸詮釋面向心理學，還好當時他帶我們建立一些基礎，才讓我有另一個角度看創傷，開始讀懂精神分析裡面的語彙，包括性慾是怎麼回事。性慾整體面向完全不是我們想的，只是在某個時刻跟某個性器官接觸才會發生的事。你這個人作為身體的、心理、歷史、文化、社會、關係的存在，以這樣的狀態，拼命想要活下來，想把你的活跟他者、世界做連結，這樣的慾望本身叫性慾，或佛洛伊德把它叫生之慾，另一個極端是死亡慾望，就是切斷關聯。你在這樣根本的觀念上看到，人的存在不可能是個體，而是跟他者、社會連結的慾望，甚至跟想像層次，而所謂死亡或憂鬱才是切斷的狀態。

這樣創傷的理解後來影響我看家內性創傷，以至於我在做個案訪談，發現我不能只做訪談，而是要進到他們的生活裡，看到他們的日常生活狀態，一起參加抗爭。很難想像在法國有一群家內性侵受害者，到 2000 年之後在巴士底廣場集體現身，跟政府要求修改法律，因為受害者權益一直沒有被認可，我就陪著他們去參議院抗爭。在巴士底廣場我們做了一個嘉年華，就像三一八那樣，有很多帳篷佈置說明，我們也向走過的人說明。在這樣的情況裡面，我幾乎跳脫臺灣傳統心理學家角色，進入像是人類學的田野裡去，這也讓我了解創傷的形成跟療癒，永遠只能在關係以及社會情境中發生。

2007 年我回到台灣，我認為要勇敢點，去觸碰重大社會歷史事件。這時候我們回來碰觸慰安婦議題，整個國際的倡議運動都一直在走下坡，臺灣只剩下 17 個慰安婦。我在那情況底下，以搶救的心情去接觸他們，後來整個研究在臺灣比較走向文化研究，跟文化、歷史社會學家有比較多對談。我二十歲在台大看到悼念四六場景，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衝擊，但當時所學、所訓練沒辦法去承接大規模的歷史創傷事件。後來我做慰安婦議題兩年多以後，還是不太敢進去二二八跟白色恐怖，我覺得一己之力完全沒有辦法去參與的。可是在一個因緣際會下，有點像鬼會附身這種事，很多文化人類學研究會碰到這類事，可能到一個部落、田野，就會發現後面不是我只有一個人。我講這個靈異事件，某種程度象徵真實的事情，我天主教徒原本認為不可能，但終究發現不去做某些事情就無法安心。總之，我好像被推要往那方向去，就開始先去接觸 50 年代的白色恐怖前輩，開始對談認識，然後就整個被捲進去了。

我的介紹到這邊為止，接下來想要問各位、大家的狀態。我接下來有三個問題。第一，歷史創傷既然已經封存，就把它留在過去不好嗎？這個問題讓人想到某一部電影，那你們的想法是什麼？

觀眾 A：《返校》。我覺得只是封存的話，問題還是會在某個時間點浮現，所以不可能封存，不如好好經營他。

彭仁郁：如果精神分析有公式的話，第一個公式就是：所有被潛意識掉的，會用各種方式永恆地回歸，以症狀發生。用精神分析角度來看，大家會覺得不可能封存，甚至連封存本身都是一個假象，極力封存反而會造成個體、集體的症狀。像韓國瑜為什麼當選？我覺得這是一個集體症狀，恰好是我們黨國體制沒有好好反思。

第二個問題，你認臺灣社會普遍對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觀念是否成熟？

觀眾 B：我覺得以亞洲地區來講，臺灣對這四項觀念相對成熟，但如果說對整個國際社會來講，臺灣始終比較偏向民粹方面多於民主。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年來，一到選舉就會有藍綠分裂、對決，要把自己那套強加在對方，但民主的狀況應該是，我們有不一樣的意見要互相尊重，可是這幾年來臺灣社會慢慢越來越偏向民粹走去，而不是民主自由這方面。

彭仁郁：謝謝，你回答得很棒。對，你講得很對，在亞洲地區，可能要看誰比。

觀眾 B：跟香港比也是一樣，臺灣更民主。

彭仁郁：跟什麼時候的香港比較？

觀眾 B：一直以來都是。

彭仁郁：香港即使在英國殖民下，沒有民主是確實的，但他的自由度程度是全世界前半段，不然不可能吸納那麼多外資在那座島上。香港的人權觀念從 50 年代勞工權的鬥爭行動就開始，臺灣在 50 年代，勞動權、左派思維被打壓，地下黨要斬草除根，那時的左派被視為「危險」，可是人權跟左派的觀念是不可分割的。

不過提到法治，民主自由大家都熟悉，可是大家對法治有想像嗎？惡法亦法是不是法治觀念？惡法亦法，通常我們那年代的老師都會說惡法依法就是規定，大家就要守法。如果是惡法亦法，我們今天就不用做轉型正義，絕大部分我們現在找得到的、有證據，也就是有留下判決書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有一個被宣稱「合法」的審訊過程，這些案件的不法性要一直到我們做轉型正義，回頭去看才發現，宣稱合法，但在程序上其實是違反當初的憲政。中華民國雖然那時候是在戒嚴體制，但戒嚴的位階不能超過憲法，審判程序還是要公平公正。反觀來說，若以合法手段審判回去檢視，就發現審判過程不符合自由民主，有很多刑求逼供的情況。如果有刑求逼供，不管這人有沒有犯罪，我們都沒辦法知道了，因為他的自白書裡被迫承認他可能沒做過的事，判決的正當性就得取消。可是這些事情，在戒嚴時期無法被爭論，沒辦法以人民的角度告訴國家要怎麼做，以前的法治就是國家說的算。

臺灣在戒嚴統治下是獨裁統治，我一直到去法國唸書之前，都沒辦法說出「臺灣曾經在戒嚴時期是一個威權統治」這樣的字眼，我無法指認國家是威權統治、統治者是獨裁者，這是大逆不道的，因為過去的我是純正的「中華民國人」。而現在當我們把檔案、受難者找出來一一了解，就會知道當時國家是犯法的，獨裁者一意孤行地去壓迫任何反對他的人，這是事實。我今年 50 歲，在法國唸過九年書，到現在我在講獨裁者時，還會冒冷汗，這是因為戒嚴統治在我身上作用了將近 20 年，使之成為我的生活基底，我要反對自己的生活基底的時候是多麼可怕，20 年來建造的生命秩序要重新來過、被剷除。而現在我在這裡，表示我已經做 30 年的反思，卻還是會發抖，可想像我們這些受統治的人從來沒有這個反思的條件，不管是思考上或是社會條件，怎麼去面對蔣介石、蔣經國是獨裁者？那是要放棄、推翻原來的生活秩序，會引發焦慮。我們無法成熟看待這些事，是因為我們無法面對自己國家的過去。

再來，臺灣民主化三十多年，轉型正義與我生命有何相關？如果轉型正義是國家要做的，像是有促轉會、受害者不是都有被賠償的嗎？起碼有能力證明他的確是受難者。在國家元首這方面，自李登輝開始跟二二八家屬道歉，然後是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他們都在每年二二八活動道歉，可是如果你是二二八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屬，國家元首的道歉，你願意接受嗎？

觀眾 C：我可能沒辦法接受，接受就像在逼迫你忘掉那些發生的事情。

彭仁郁：有沒有人覺得國家元首道歉就夠了？前面三個問題會濃縮在現在都還看得到的迷思。第一題可能大家會覺得比較好回答，都過去這麼久，為什麼要揭瘡疤？這種話可能會來自於他的家屬，說不要耽溺過去，要向前（錢）看。不過這件事情好像昨天被高雄人推翻，但是不是這樣的意義？我們也不確定。

轉型正義會撕裂族群、是政治追殺，只針對國民黨？認為是政治追殺的舉手？感覺大概三分之一的人還在猶豫。這到底是不是政治追殺？這的確看他怎麼做。其他國家做轉型正義，這是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要從不是民主國家進入民主化的狀態，這的確是要對之前國家犯的錯要反省。有些國家在轉型正義的過程當中，讓本來壓迫人民的政權倒了，新的政權也可能

會利用這樣的機會去做公報私仇。但臺灣不是這樣，我就直說，2018年發生了嚇嚇叫的東廠事件，促轉會在那時候被講成是要打侯友宜，這件事情就是錄音檔外流且經過處理。對話提到：在選戰當中，侯友誼「這議題」沒操作很可惜。這句話他真的這樣講，但脈絡上來提，他是說民進黨立委沒有操作很可惜。不過，鏡週刊在擷取部分錄音帶的過程，讓大家不知道前後脈絡是什麼，就直接說促轉會要來參加選戰，怎麼可能？促轉會是合議制，裡面的委員票票等值，就算你是主委、副主委都無法干預。錄音是在一個私下場合，就是茶水間的聊天被錄了下來，又被交給很有心的媒體，就變成一個獨家炒作的事情。

這不應該發生，但因為在其他國家在做轉型正義，有些委員被暗殺，因此我們都很慶幸說還好只是東廠事件而已，委員們沒有生命危險。那時進去的時候有人告訴我們會有生命危險，但我們就還是賭了。現在裡面有一位是社民黨，其他都是無黨籍。如果在國民黨底下不會有機會做轉型正義的，畢竟他們是加害體制，在還有勢力的情況下，不可能拿石頭砸自己的腳，民進黨上台比較有可能進行轉型正義。但以我們內部的角度來看，為了順應民粹，他們在挑人選時太妥協，希望國民黨也能夠接受，因此第一任組合是有問題的，導致內部協商並不順利，大家拿不出共識。

另一個迷思，受害者已經拿了賠償金，為何還要舊事重提？這個其實跟前面不太一樣，這是把責任加在受害者上，認為你們拿了錢，就應該閉嘴。一條命可以換多少錢？600萬。如果你們家在二二八被槍決，或你在白色恐怖的時候，在沒有任何證據的狀況下，只因為國家認為你要反抗他，判了死刑槍決，國家在30年後的今天賠600萬。那如果你被關30年，請問可以拿到多少錢？如果你進去25歲，出來後55歲，也就是你人生最精華的時候，都葬送在監牢裡面，出來之後沒有工作機會，可能開始有精神症狀，沒辦法結婚、成家。好不容易成家，你的小孩也不知道你經歷什麼，這樣可以換多少錢？最高590萬，590萬換你30年的青春歲月，你要不要？可是他們就被形容成是一群死要錢的人。

另一個比較進階版的，真相就能換來療癒？意思是我只要把檔案都找出來，知道誰判了我家的刑，或蔣介石有沒有更動我家前輩的刑責、刑期，我知道了，這樣就會帶來療癒嗎？其實沒那麼容易。但我們到現在就是這種狀況，現在臺灣社會用這種條件在要求受難者、家屬，要求整體社會接納一個非常妥協的所謂正義，但卻是非常貼近不正義。另外也要求他們不要一直記仇，我們都會常常聽到，受難者不要記仇，家屬要放下，受難者家屬自己有時候會說這種話。要放下、跟自己和解，生命才會更好？但是我們都知道，你就算自己是二二八受難家屬，都不可能為其他受難者代言，你們沒有任何一個人能為誰的創傷、受難代言。

我一開始進入促轉會，包括我學術界的同儕，很多人都很驚訝，他們認為我做近代分析，為什麼接近代分析。我也很驚訝促轉會怎麼想找我？我那時候知道政治創傷需要療癒，可是需要療癒跟我要進到這裡去展開轉型正義工作，好像是不同的事情。但經過兩年的工作後我才發現，原來心理師跟有心理背景的人在思考時會有不同角度。比方說找到政治檔案怎麼樣去幫這個家屬了解這個檔案內容？雖然有歷史專業的人來幫他解說，可是檔案是國家製造出來的官方歷史版本，存在著解釋事件的角度，而且在那時代留下的證據，其實已經預設誰會看到這個文件，看到文件的人，未來會怎麼樣重組真實？當時可能就有這些思考，所以他有的內容是真的，有的是捏造的。事後家屬來看，會發現檔案描述的前輩，跟他心目中對前輩的記憶是不符合的。那他怎麼面對這樣的事情？他還會支持檔案要公開嗎？公開以後的衝擊又是什麼？種種這些事，其中包括國家能做得到跟做不到的，例如真相無法重建，有的檔案找不到。前陣子我們公佈了林宅血案跟陳文成命案，有很多檔案被摧毀。林宅血案的關鍵在於，林義雄先生他的女兒被殺死之後，那個兇嫌在家裡面打電話出去有錄音帶，我們找到一

個證據是把這個錄音帶內容銷毀，但我們沒辦法找到那個錄音帶。像這樣的事，接受你的妻兒死亡真相，這需要心理工作。

有一個例子是，一個 T 前輩在促轉會成立的時候來找我。他就說：「彭委員，其實真的不用」，他年紀很大了，已經快 80 歲了，他說：「其實我們能夠活到現在的人，自己都調適好了。」如果有問題的那些，可能還沒出來之前就瘋掉、自殺，那些很痛苦的都離開了。可以活到現在是可以調適，不用療癒。但一年後他急著回來找我，他平時一個人住，在跟我講完後幾個月，就跟女兒出去旅行，這是很久很久他們第一次出去，出國旅行住在同一個房間。女兒就跟他說，爸爸你每天晚上睡覺都在拳打腳踢，好像在做惡夢，會一直尖叫不要再打了。他知道後非常驚訝，因為他不曉得會這樣，而且是每天晚上都這樣。他回到台灣，打電話給他一個認識 60 多年的難友，剛好難友身體不好，沒接電話，是他兒子接的，他們就聊起來，他兒子就說：T 前輩，你不知道我爸已經吃安眠藥吃了二三十年了嗎？因為他憂鬱症，晚上睡不好覺。T 前輩非常很驚訝，他們認識 60 幾年，一起被關，但卻從來沒說過他吃了 20 幾年的抗憂鬱劑跟安眠藥。T 前輩為了這兩件事情來找我，他說彭委員，我要告訴你，其實很多還在做惡夢。的確是如此，幾乎每個我認識的前輩晚上都在做惡夢，只是有人知道，有人不曉得。那些我們看到願意出來見證、看起來很開朗的受害者，可能半夜會傳簡訊跟我說，我好想要就這樣了結，因為撐到現在還是非常痛苦。就算知道越來越多年輕人願意聽故事，可是午夜夢迴，他們還是覺得一輩子葬送掉，在夜裡翻來覆去，我把它命名為：政治暴力創傷的現在進行式。

剛剛謝老師說他二十年前跟張炎憲老師開始在做口訪的時候，就已經發現這個故事非常沈重。他是非常厲害的歷史學家，有些在做口述歷史的人，他們就是把問題問完就離開，不太知道怎麼處理這些攪動起來的情緒。有人比較敏感，一開始是帶著：怎麼辦我們把人家的創傷撈起來，不知道怎麼收拾，但很多人其實無感的，會覺得好像對方只要把東西講出來就好，只要說出來對方就會好過一點，可是說出來，一開始其實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們認識很多前輩，本來都不願意出來做見證，後來因為覺得其他前輩一個個凋零，他們有責任要接棒才出來說。出來後他們發現，好幾個月，每天晚上，本來是在無意識的狀態會呼喊，越是敘述這些故，恐懼感會讓他們失眠，當初遭受酷刑的細節會重新回來，有時候會陷入創傷解離的狀況。解離的意思是說，對這個人來講，這個酷刑就是此時此刻正在發生，而不是 3、40 年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會看到創傷的後延性，有些性格硬的前輩，他們當初怎樣被酷刑、被打落牙齒都可以吞下去，即使是這樣的硬漢前輩，他們到晚年身心的狀態虛弱以後，會有很多 flashlight。flashlight 是在說，一個過去的創傷記憶的復返或是侵入。大家應該看過蠻多對戰的電影，有部電影是《雷恩大兵的中場戰事》（《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就描述我們所謂的 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這是最顯著的一個創傷記憶狀態，就是記憶入侵。那個記憶入侵，你可能聽到煙火的聲音，以為是槍砲；看到鮮艷的煙火，接受到卻是的你流血、被炸的情況。有時候有的前輩身體還硬朗的時候沒有感覺，可是當他們身心狀態虛弱的時候，尤其在過世之前，會有非常多 flashlight 回來。他們會以為有人要抓他們，很多家屬在前輩們過世前不得不把他們綁在床上，要不然他們半夜會一直想爬起來，可能跌倒、骨折。可是束縛這件事情，會讓他們再度陷入、喚醒當初的創傷記憶，因為很多前輩是被倒吊、綁著被打，所以光是被綁的狀態，會讓他誤會又回到那時候，這就是我命名的「創傷的後延性」。

另一個則是「創傷的現在進行式」，我又名為「創傷的代間傳遞、代間創傷」。意思是不僅是經歷過白色恐怖或二二八的當事者留下創傷，甚至包括沒有經歷的後代，也會用不同的方

式遺留下影響。這或許剛才有講過，有時是惡夢，有時候會有各式各樣看起來無關的狀況，比方說胃潰瘍、皮膚病或者失眠，甚至有的人會有嚴重精神分裂，現在叫思覺失調。他為什麼會被指認為思覺失調？就是我們親身拜訪的前輩，認為特務還在跟蹤他們。如果你被特務監視三十年，隨時都準備被帶走，你當然會一直覺得國家在監視你。民主化之後，也沒有人來告訴你已經民主化了，對於這些前輩來講，那個監視是繼續在進行，他不知道什麼時候終止，沒有人告訴他們這件事。這些前輩出門的時候會瞻前顧後，整個人的狀態看起來非常奇怪，也有很多人會被認為是被迫害妄想。但這個被迫害是不是妄想，其實是界於真實跟想像之間，因為是真實發生過，所以必須要有防備的狀態，不管有沒有，卻真的這樣被迫害，這會影響他的日常生活甚至跟家人關係，因為他不知道家人有沒有被收買。

口述歷史裡面看得到，有時候特務為了進行監控包括心理操控，會進到你最親密的人際關係中，促轉會有拍劇情片《反白》以及看監控檔案的紀錄片《不是自己的寫的日記》，都是羅景王導演拍的，你就會看到其實特務，也就是當時黨國體制的監控系統，是滲入到生活每個層面的。他會去找你最好的朋友，甚至會找親密的伴侶、家人，邀請他們一起監控你。特務會找到正當的理由，比方說他會跟不知情的家屬說，你知道你先生現在在做什麼工作嗎？他不只危及自己，可能危及小孩，你要幫忙讓你先生改邪歸正。如果你自己對你先生，本來沒有那麼信任，或是本來覺得很信任，可是政府突然把他抓走，又尤其另一半不能告訴你他參加組織，當人突然不見的時候，家人會開始受影響。特務真的有做某種程度的心理訓練，會用很溫柔的方式，幫助驚惶失措的你，告訴你你先生怎麼了，可是你必須聽他的才能救出丈夫。因為這樣的事情發生過，有的前輩會懷疑家人是不是監控他，有人甚至覺得他妻子迫害他，在飯裡下毒，也不准小孩吃媽媽煮的。

這樣的狀況非常多，看起來是精神疾病，實際上是人造的，想像這個人如果沒辦法在信任關係當中，他進入一個孤立的狀態，不知道要相信誰，也就是「基本信任的斷裂」，他不只是無法相信政府、沒辦法相信親人，他可能連自己都沒辦法相信。很多政治犯被抓的時候做了「什麼」，這「什麼」是政府或抓他的人命名的，比方說你參加讀書會，你只是去讀書，根本沒有把讀書跟叛亂連在一起。可是當你被抓的時候，你不知道你做了什麼，這件事的意義是由別人幫你定義。比方說你在滑手機，可是他們就把你滑手機的動作命名成你在搜集國家機密，而且對岸常常就說，這是跟境外勢力結合。你只是純粹滑手機的動作，當它可以隨便被加上意義的時候，你還敢做任何動作嗎？這是非常細緻的心理控制手法。比方你在打字，你真的就在打我的心情，可是我告訴你說，你在透露國家機密，你不應該做這個動作。這些本來只是稀鬆平常的事，只是讀書，可是他告訴你讀進去的字是有毒的，當你的思想開始被書污染，會害到國家其他成員，你現在隨意做的動作都可以被定下叛亂跟出賣的污名，這是由國家來定義你的行為舉止的意義，會讓你沒辦法生活，因為你可能呼吸、出門散步、交什麼朋友都被定義，甚至連自己都沒有辦法信任。

二二八家屬，我要講的是幾個代間創傷的例子，有 50、60 跟 70 年代的。二二八是 1947 年，距離現在 73 年。二二八家屬說：心裡有個大洞無法填補起來。二二八發生的時候，林女士剛出生不久，所以他是沒有記憶的，他父親被抓走，是很有名的知識份子。二二八事件，有很多受難者不是當天受難的，起因是二二七查緝私菸，當時國民政府派來的官員跟臺灣人民，在兩年的相處當中，臺灣人民突然發現不是回歸祖國，而被看作二等公民，又因為歧視、生活的困頓，再加上查禁私菸的動作，婦女被毆打，連求生存都變得困難。最後是因為受不了，沒有想要推翻政權，只是想要政府把殺人的公賣局查緝私菸的查緝員交出來。之後二二八，人民開始包圍長官公署、今天的行政院，長官公署不但不交人，還下令射殺、無差別格殺，那時因為臺灣軍隊跟警察還很少，所以在 3 月 8 號開始從中國派軍隊，從基隆港上來，陸陸續續去所謂綏靖、清鄉，一個個城市去搜查，把不服從的人開槍殺死，把很多試

圖談判的菁英抓起來槍決，有非常多知識份子醫生、報界、出版界、文化界的人在那時被殺死。

林女士在他爸爸被殺的時候沒有記憶，可是媽媽帶著他跟他的姐姐到處流浪，沒辦法營生。媽媽本來是家庭主婦，後來幫人家打雜，可是帶著小孩非常困難，只能把兩姐妹寄託在親戚家，但親戚怕被牽連。那個年代就是，如果今天你親戚或朋友如果發生嚴重事情，你會不會窩藏他？你敢窩藏他嗎？很不幸的，香港狀況完全讓我們想到那年代發生的事情，香港警察每天對人民施暴，你現在可以看得見、可以知道，但在那時候是沒有辦法的，政府有絕對的詮釋權，就是為什麼要把你殺掉，在你身上安很多罪名去正當化殺你的動作。這兩個姊妹的父親，被指認成匪諜槍殺，本來是文化界很有名的人，因為被政府說他幫暴徒跟政府談判，他成了匪幫的頭頭被槍殺。親戚非常害怕跟他們接觸，兩姐妹就被當人球在親戚丟來丟去，大家不敢收留他們，媽媽也很難生存。後來媽媽在他六歲的時候自殺，這兩個女孩正式成為孤兒，大姐後來被診斷成精神分裂者，他一直說自己比較幸福，因為爸爸走跟媽媽走的時候，自己都不知道、不懂事，可是當時姊姊已經 9 歲，也經常承受親戚的負面情緒跟羞辱。姊姊很早就必須結婚，這樣才有辦法替兩人找到經濟的支援，結婚後沒多久就被診斷精神分裂。妹妹他說他運氣比較好，但還是很痛苦，他後來結婚也生了小孩，一輩子就帶一個黑洞在自己身上，她會在情感上，莫名不敢接近自己的孩子。從小爸爸、媽媽都離開，讓他的際關係變得很奇怪，不知道跟別人情感要投入多深，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失去，隨時隨地會失去親人的時候，你會開始變冷淡，不去做人際。她的女兒也非常痛苦，一直到後來她女兒學了家庭治療，想辦法修補自己，她年紀比較大時，被女兒拖去家庭排列。在這過程當中，她突然覺得自己變成小女孩的樣子，跟爸爸媽媽哭訴。原來她沒辦法跟自己的女兒做連結，是因為自己沒辦法脫離小女孩的狀態，因為她還在問她的爸爸媽媽在哪裡，這是她的狀況，她後來也一直在照顧思覺失調的姊姊。

然後潘先生也是二二八家屬。二二八發生的時候，爸爸在嘉義火車站前面槍斃，其實就是潘木枝醫師的小孩，就是嘉義市的一個人道主義的醫師。他也是在二二八時候被派去水上機場，因為有民兵要跟國民黨政府對抗，民兵試圖要把水上機場佔領下來，後來彈盡援絕，雙方僵持，潘木枝醫師跟陳澄波被派去做和平使者，他們當然就被抓，遊街示眾，在嘉義火車站前面被槍決。被槍決的時候，跟我講話的潘先生，這位老四才 12 歲，他在場，家裏沒有人知道。家人以為只有老三，就是他哥哥那時才 13 歲。爸爸倒在血泊的時候，因為他生前被酷刑，太痛苦，所以他叫喊後下巴脫臼，哥哥就把爸爸下巴推回去，還有死不瞑目，把爸爸眼睛蓋下來。後來老三變成家暴的施暴者，他們的大哥怕被牽連，在逃中，二哥在援救父親的路上被殺死，老三年僅十四歲要扛起家裡。結果他自己的情緒沒有出去，他帶弟妹的方式就是用毆打的。

至於老四，沒有人知道他在，他一輩子就活在，他以為他家人知道他在那，但家人都不知道的情境下。他們不知道他目睹了那場景，他說他最近才有辦法講，因為那一刻情緒靜止了，當時他 12 歲，一滴眼淚都沒有掉，可是那個場景就一直跟著他到處去，後來念了台大獸醫，然後去日本留學。他運氣很好，因為很多人出不去，而他也非常優秀，去東京大學拿到博士以後，他去賴比瑞亞，把那邊的畜牧業從無到有建立起來。後來他就失去了臺灣的國籍，長年在日本，等到他 90 年代，才第一次願意回到台灣。他不想再踏進這個警察國家，等到民主化才回來，回來之後他看到那時的李登輝的副總統蕭萬長在電視上說他爸爸，說自己小時候被潘木枝醫師免費醫治，說很感謝。那時候我們才剛在談二二八，他聽到蕭萬長在講，眼淚才開始掉下來，經過 50 年，眼淚才掉下來，也自那刻起，心中的黑才逐漸鬆解。但一直到前兩年，我剛進促進會認識他的時候，他一直以為自己是憂鬱症。我剛剛講的歷程，以我們現代人的觀點來看，你會知道說他的憂鬱當然是跟 12 歲的經歷有關，可是他自

己一直到遇上我，才有辦法命名這個東西叫做創傷，才開始發現自己憂鬱的狀態跟情緒的困擾，是跟當初 12 歲目睹爸爸被槍決有關係。我們都以為受難者跟受難當事人還有他的家屬，可以很容易說出自己是政治暴力的創傷者，其實沒有。在經歷那些事情，他就是目睹他爸爸被殺，就這樣停在那裡。他大概很恨政府殺了他爸爸，可是不知道這是政治暴力，他也不知道這哭不出來的情緒、麻木跟創傷有關，這個指認的過程非常複雜。

你會看到 K 先生，他是白色恐怖二代，你看他的痛苦在哪裡。我們不要以為創傷是這個人擺在我們面前，就可以告訴我們創傷是什麼。他沒辦法告訴你：我的創傷就是什麼，然後把 PTSD 的那些點告訴你，他的語彙大概就比較像是……你會知道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這些話表面跟創傷無關，可是他在講的時候欲言又止，他一直繞圈圈很痛苦，但一直沒有辦法把他講完，創傷在語言破碎的狀態呈現。他說：「蔣介石讓我們家破人亡，這個國家的人還把他當民族英雄在崇拜。」然後就說不下去了，那你怎麼指認他的創傷呢？你只能從他說不下去這件事來看。我叫他 K 先生，他實際是很有名的大學者，他對我們臺灣的政治體系瞭若指掌，怎可能不知道這國家怎麼回事？他怎可能不知道蔣介石為了捍衛政權就做這些事。理性上是這樣講沒錯，可是講到他爸爸的時候，他用的是「家破人亡」，雖然他爸爸沒有過世，但被抓過兩次，一次是他出生前，被抓第二次是在他出生後，也就是說還沒被結婚前已經被抓一次，但不怕死，結婚後還繼續去參加其實沒什麼了不起的活動，就有點像你今天來聽演講這樣。對一個讀書人來講，我去唸歐陸思潮、民主思潮，對國家來講就好恐怖，就像現在中國很多歌被禁，好像小熊維尼也被禁，真的很可怕，你們都不知道你做了什麼可怕的事情。你們在當代，一天做 20 件事，有 18 件會被抓去關，而他是讀書人，當然想要國家更好，如果我不為社會貢獻，幹嘛當知識份子？爸爸就在這種心態之下，即使結婚生子，還是去參加這種演講活動，要讓人民開始自主。那是 50 年代的事情，結果就被抓了，第二次差點回不來。他爸爸對他來講是英雄，可是英雄不在家十幾年，等他回到家之後，不在家的爸爸突然很想要彌補他不存在的這時間，於是他變成一個很嚴厲的爸爸，而 K 當然非常努力，變成一個大學者，但父子關係非常緊繃、很痛苦，他沒辦法有正常的父子關係。對他來講，被抓以前溫柔的爸爸已經不在了，他沒有機會認識這個爸爸，是這個讓他有家破人亡的感覺。

媽媽本來也差點要跳海。有次媽媽去綠島看爸爸的時候，在船上差點撐不下去。那時候臺灣要去綠島很複雜，你現在會擔心船不開，那時候你光是從西岸到東岸都要花很多時間，過去你只能看 15 分鐘，而且一個女人要顧家、要想辦法賺錢，可能幾個月才能去一趟，去一趟只能看 15 分鐘，有時候還不能講話，因為 50 年代的時候大家國語講不好，你要不就說日文，要不就說台語、客家話，可是不可以說官方聽不懂的話，所以那 15 分鐘只能對望著，什麼話都講不了然後就要回來，等下次會面。我想光是這樣講，你都能感受到重量，這媽媽要做這樣的事情 15 年。後來有一次媽媽去，不讓見，等了三個月，連 15 分鐘都見不到，媽媽那時候就差點跳海。這樣的痛苦其實非常難想像，因為不是我們的經驗。我們到現在中正紀念堂還在，我們都沒有說要拆他，促轉會很卑微，說什麼可以打國會，這是大笑話一個，我們多卑微，光是說我們來討論這銅像要怎麼辦，來看各縣市有幾個銅像就很可怕。我們居然要反省他？我們只是要算幾尊銅像，好可怕？我們只是要問國民黨，因為當初黨國不分，有非常多蔣介石作為總統批的檔案，現在是國民黨黨史館收藏，我們只是想把檔案收歸國有，政治檔案法也通過了，應該變成國有的，可是國民黨告我們，因為我們好可怕是綠色恐怖。告我們不打緊，他現在告不成，還說一件檔案要賠他們一百萬，因為是財產，這官司有得打，我們就看下去。

第四位是 60 年代的白色恐怖二代，他自己是被診斷成躁鬱症的患者，已經服藥十幾年，他也是近幾年才開始想說，我的症狀好像是創傷。躁鬱症意思是，有段時間會很躁，會想做事情、找人家聊天，另一段時間就會開始進入鬱的時期，開始有自殺的意念，不想出門，洗澡

都很困難。後來我們談話過程裡面，他就發現他沒有很明顯的躁期，但他每次掉下去想要自殺的時候，都是因為人際關係發生很大衝突，這衝突常常都是因為關心他的人想知道他們家發生的事情，可是他一開口說到國民黨，對方就開始說你怎麼那麼偏激？要是我也會覺得很憂鬱。可是就是國民黨把我爸爸變成這樣的。有這樣一些例子，有前輩到現在仍然覺得特務還在監視他，他爸爸是其中之一，他爸爸就是有被迫害妄想，不敢出門，也不敢讓別人進去他家。他就說：「國民黨弄壞我爸爸，我爸又把我弄壞。」可是他這樣的句子對一般人來說很難理解，什麼叫國民黨弄壞你爸爸？特別是我們現在有多少縣市首長還是國民黨，包括花蓮、臺中，國民黨在臺灣是最大反對黨，是政黨、人民團體。他朋友受不了，也很難理解，而他的挫折在於只要講到某些關鍵字，別人就會開始反感。這對他來講是不可承受的。他被說要中立，藍綠惡鬥很久了……，之類的話，就害他突然不敢講話了。可是我要講我的傷當然開始激動，我要告訴你我爸爸發生什麼事情，甚至有人說，你爸爸被列為黑名單，他做了什麼？他其實講不出來，因為他爸爸已經沒辦法說了。

我好不容易成功進入他家那次，他爸爸知道我是誰，也很珍惜我給他的名片，有促轉會對他來講很重要，他還把促轉會揭牌的剪報小心貼起來收得很好，所以我知道這件事對他來講很重要。可是他見到我第一句話是說：「我什麼都沒有做。」我很努力地告訴他，前輩，真的沒關係，就算你那時候有做什麼，那是對台灣民主很重要的事情。但他還是說：「沒有我沒做什麼。」他沒辦法承認他做了什麼，像這樣的前輩無法進入口述史，因為他已經講不出完整的東西了，他已經五十年都活在沒辦法替自己辯解的情況。小丰就繼承了這個無法辯解的狀況，大概一開始要辯解的時候，就會掉入無語的狀態說不出來，他的朋友、同儕、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就沒辦法知道有什麼好講不出來的，大家一直想像講出來很容易。

Z先生是70年代白恐二代，你會看到K、小丰、Z、林女士、潘先生，恰好他們的父親，都是在那年代想做什麼的人，那年代他們想做的事情，跟現在香港黃之鋒還有陳建民這些民主前輩們想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像的。當然，他們不是所有人都是最有名的，像是林女士、潘先生跟K先生的爸爸是有名的，可是小丰跟Z先生的爸爸不算是最核心的成員，可能就是發傳單。大家知道中國其實有地方選舉嗎？中國選舉很不可思議，就是大字報上就一個人名字，然後在旁邊貼一大堆名字，原來那只是貼出有資格去投票的人的名單，你的身分證、電話、職業，所有個資會被寫在上面，你被投票會被指認，人家就會看說你要投給誰。意思就是說：我們知道你要來投票。你說可不可以有黨外參選者？法律說可以，但我就知道一個狀況是，有一個縣有萬年縣長，有人很勇敢去登記，卻在門口被擋住，那時候還沒有說跟境外勢力結合的時候，他就找了BBC的記者到場，不過現在當然沒有效了。十年前，因為有國際記者在裡面，所以只好讓他去登記，登記出來以後，有件很好笑的事情。他說：你不可以宣傳，那誰會知道你有參選？我們講的小丰跟Z先生的爸爸，在那個年代，他們去幫忙助選，就是讓鄉鎮的人知道這個人有要出來參選而已。

Z先生又說什麼？他為什麼這樣講？二二八跟白色恐怖不只離政治暴力創傷很近，而且政治暴力創傷經常都是用精神症狀的外在方式表現出來，所以很多時候他們被當成精神病患。小丰跟他自己的爸爸還有Z先生的兄弟姐妹與父親也是，Z先生有五個兄弟姐妹，他是倒數第二個，他幾乎是唯一一個看起來算正常的小孩，其他小孩可能每個都有精神症狀。最嚴重是他的大哥大姐，他大哥大姐年紀大概比我大十歲左右，他們70年代讀小學，當他爸爸被抓的時候，大哥大姐剛好在唸小學，他們在學校就是會被叫到升旗台上面，說他們的爸爸是匪諜、被訓話，叫別的小朋友要跟他們保持距離，那個年代的校長可以做這樣的事情。結果，大哥大姐是精神症狀最嚴重的，這是一個制度化的霸凌。我問Z先生，你怎麼想這些師長？他說這些師長把你們污名化，他們以他們的正義來傷害我們，他會覺得傷害我們就是為國家主持正道。就是當我是一個堂堂正正中國人時，我會去指認所有那些不做中華民國人，他們

就是不義的、是壞人。為了為國家主持公道，我最好的方法是傷害他們，而且傷害其實是沒有罪惡感的，本身也是正義的，那年代是這樣。

轉型正義最大的敵人，大家應該可以理解。前面解釋什麼叫做「政治暴力創傷是現代進行式」。對當事人來講，創傷有延宕、延後的性質，對子代來講會有代間創傷的效果，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要做什麼？轉型正義最大的敵人就是時間，我們過了民主化 30 幾年才開始追溯，當事人都凋零了。尤其二二八，現在只剩下二七部隊的隊長鍾逸人先生，103 歲，黃金島先生 2018 年之後去世，他是二七部隊副隊長，他還有來參與我們第一波罪名撤銷儀式，還好趕得及，好多人都過世了。白色恐怖的受難前輩，這幾年來不知道送走多少位，我其實就是希望他們走的時候，都會記得這社會上，絕大部分的人都是支持他們了，這是我進促轉會的唯一目的，希望他們在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或他們的小孩，在這個過去長久被污名化的情況底下能夠知道，這社會不只接納、理解他們，還願意聆聽他們不同敘事的版本。

包括這些受難前輩到家裡面，怎麼把他們身上承受這些不義的暴力轉化，因為沒地方發洩，們有時候的確就對自己的小孩子施暴了，不管是實際肢體上、心靈上或情感上。二代跟三代都不敢說，因為現在好不容易轉型正義，大家願意聆聽他們父親輩的故事，如果我們把父親跟母親前輩的陰暗面呈現出來的話，他們會被原諒嗎？我們的社會好不容易才接納他們的，如果我們說出他們讓我們受到的傷害，那是一個間接的國家暴力，他們承受了間接的國家暴力。當他們還不知道後面有國家暴力的時候，這些家屬的後代也要花很長的時間才知道，原來他們間接國家暴力的受害者，可是從小以為是父母親對他們施暴，或他們的父母親瘋狂，沒辦法照顧他們。當他們終於開始明白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們不敢講這件事，我們的社會也沒辦法開始理解這些複雜的、糾結的敘事，這是我們要努力的事情。

要怎麼樣打破冷漠？冷漠其實是有政治社會心理條件，加害者的冷漠或他的自我防衛，大家很容易理解。我從來沒碰到任何一個加害者會主動出來說自己是加害者，希望大家原諒我、我做了什麼、什麼。我有碰到二代在演講的時候跟我說，我的爸爸是特務，然後我不知道怎麼辦。二代跟三代可能願意出來，可是他們就算出來，也很害怕會被攻擊。我們已經不是株連九族的時代了，當加害者體制的二代三代願意出來說他們所知道的是什麼，跟他們想參與轉型正義工作的時候，我們願意接納他們一起來做這件事嗎？這個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黨國體制，當我們都是中華民國人，要捍衛秋海棠的時候，你幾乎要把這秋海棠、中華民國放在自己的生命之上。我們從小就是這樣訓練的，我最大價值就是為國犧牲，那是包括外蒙古在內的中華民國。國民黨不在意我爸為他們犧牲，可是我從小就還是被訓練這樣，這個是一個黨國體制會刻意製造冷漠條件，讓你不要對受害者那邊有同情，最好什麼都不要做。而旁觀者的自我防禦，就是我們跟我們的父母輩，那些沒有被牽連的人活在一個什麼都不要做的範圍裡面。前輩經歷八年的牢獄生活，他出來第一句話告訴我：「我什麼都沒有做。」你就可以想那年代的人，他必須要什麼都沒做才能活下來，這會形成一個緊張氛圍，讓你的父母輩不敢做任何事。大家不敢做的事情，最著名的就是張炎憲老師說的：不要碰政治。你到現在有沒有被告知？這遺毒很深，不要碰政治，那誰去管政治？政治不是眾人之事嗎？我不管那誰管？這是很有趣的，我從小都沒想清楚，到現在我才知道，因為黨國體制告訴你政治是很髒的事情，黨國說我願意把手弄髒，交給我，所以我們旁觀的人會顯得無助，你也不敢做什麼，怕會有問題。我們比較難理解的是，受害者跟家屬的自我防禦，為什麼連自己的家屬都不能說？因為真的太痛苦了，當你不確定有人可以理解那麼複雜的事情的時候，你不會那麼容易說。

關於受害者的自我防禦，因為酷刑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們要花很長的時間才終於可以聽到一個長輩說。有些長輩認為，我怎麼敢跟人家講？我被打到屎尿都跑出來，整個人都泡在我的糞便裡面，連回想都非常痛苦，我怎麼可能告訴你？我在你面前，穿得好好的、手腳乾乾淨淨，可我一想到那時候就是不堪、人形都沒有的狀態，我跟你講時，我就以為你會看到我那樣子，所以我怎麼敢告訴你？而且如果你不夠堅強，我一講你就哭，長輩會覺得，我當然不敢告訴你。我現在連十萬分之一都還沒有說，你就開始掉眼淚，我當然不希望你掉眼淚。

至於污名化就是歷史矛盾的問題，會造成二度創傷。孤立前面有特別講過，另外就是見證回憶非常地困難。為了留時間給大家，我就只講這個：理解跟命名漫長過程。其實連自己都不知道已經歷了什麼，現在還有很多受難者說，我就算看到、去調檔案出來，我還是不知道我到底為什麼被盯上，是誰把我的名字交出去？連受難者都不知道自己經歷了什麼，他沒辦法告訴你。很多人會說，就算政治檔案條例通過了，檔案之前加密，現在解密了，我還是不知道真相是什麼。還有很多人會覺得如果我夠堅強，就不會受傷，這種迷思其實在受難者當中還蠻常見，他們會覺得如果我堅強的話就好了，我現在不就好了嗎？他們不覺得自己有正當性可以在受傷狀態，有時候也會不允許自己的小孩在受傷狀態，這個正當性很難連結，他們有困難。

我在講 60 年代的小丰，他的崩潰是這樣「我每次面對別人的不理解都是不只是面對這個人而已，而是國民黨創造出來的世界，」因為我知道別人無法理解，所以我不想要講。我一講，就開始覺得極度孤單，別人的眼神讓我知道他不懂，他不懂會讓我極度孤單，我會崩潰，組不回來，就乾脆不要講，可是很恐怖，又需要講，怎麼辦？所以要有一個準備好的人，陪他去經歷這個崩解的狀態，我們在心理學講說，我是一個中介者，給一個簡單的精神分析的觀念，在做治療的時候我要變成容器，一些散亂的東西沒辦法被組織的時候，他自己已經無法承擔情緒的聯繫。受傷的人，你可以想像好像玻璃打碎，裡面的液體一直往外露出，他崩潰的感覺是抓不住自己的情緒，所以我們要成為他破碎狀的容器，容器的意思是我們只是暫時替他承受、暫時包裹他的情緒，可是我們不替她受苦，我們沒有能力替她受苦，我只是暫時把他的情緒，給他一個形狀，給他一個氛圍，給他一個可以被說出來的象徵語彙。

小丰的爸爸本來不讓我去他家，但是有一次小丰就硬把我找去他家。那一次，爸爸不是第一句話跟我說：「我什麼都沒做」嗎？在一小時過程當中就陪他一起看他的檔案跟判決書，他反覆跟我說：「我什麼都沒做。」後來我開始跟他說，不只是我，其實有非常多年輕人，當你們在說那個年代發生的事情，他們不會再把你當罪犯看待，你們不是罪犯，而是民主開路的先鋒。我不太喜歡用正面詞，可是在那個場合，他需要一點支持，讓他知道說，我們現在看他的眼光，開始改變了。我覺得他有聽進去，只是他就開始非常激動，他用台語跟我說，真的嗎？他們想知道嗎？這層他們想知道，那再下去呢？再下去呢？意思是這個事情有很多層，很複雜，你們只願意看到我們在為民主，可是還有更有關係的糾結，比方說是誰把我拱出去的？搞不好是我的戰友？搞不好我被酷刑的狀態底下，也許也在半意識狀態說出了什麼，我搞不好也背叛了誰，這些東西你們真的願意聽嗎？當然後面全都我的詮釋，因為他只能說出：他們真的會想知道？然後當下我就給大家看一個畫面，我坐在這邊，老先生坐那裡，這是他女兒小丰的手。他爸爸開始激動，小丰馬上就把手伸出去被他爸爸握緊，當下小丰也有什麼感覺，她只是看她爸爸激動就把手伸出去。可是你會看這畫面，你發現一件事，小丰已經 30 幾歲了，爸爸 80 歲，你會發現，這握緊拳頭，露出手背的手，是小女生的手。這不是一個大的女孩子在握著他爸爸的手，這是小女生的手，他就是手伸出去被他爸爸握著。

後來出來了以後，小丰跟我說，因為我陪著她爸爸把所有判決書看完，他說了所有內容，儘管這些內容在小丰 5 歲開始，她爸爸就不斷告訴她，可是她根本就不懂，那是充滿著沉重情緒跟激動、神秘、無法理解的訊息。她也沒有要懂她爸爸發生什麼事，因為她爸爸的表達方式無法懂。可是那天我陪她爸一個小時，終於讓他從 5 歲到 30 幾歲，第一次聽到她爸爸可能發生什麼事，以及她爸爸怎麼被追捕的過程。其實很多受難者家屬都是這樣，一直等到外面有人進去了，他才從第三者的問話，或趁著當事人跟第三者講，才有辦法用冷靜的耳朵去聽到發生了什麼事，才知道說原來她爸爸的家曾經被軍警包圍，就是要抓恐怖份子的徵兆，把她家包圍起來，多可怕的事情。你可以想像你家有一百多個軍警，而且可能都是重槍炮，只是為了來抓你，只為了你去發傳單，那是多可怕的事情。所以她第一次終於可以聽到什麼爸爸經歷什麼，可是同時間，當她爸爸開始激動的時候，她手伸出去了。過去她不敢回家面對爸爸，那次是帶著我去，她才有辦法回去跟她爸爸那麼靠近在聽這件事。她想起小時候，她都忘了，他爸爸一直以來都是這麼激動，每次講到這種事的時候，她從小知道，就知道要把手伸出去被他爸爸握緊，然後她爸爸就會慢慢冷靜下來，所以手伸出去的感覺是非常複雜的，那個動作，她忘記她曾會如此，那是一個下意識的動作。她爸爸握著她的時候，她想起她小時候無數次在做這個動作，想辦法安慰他爸爸。

我第一次去看她爸爸的時候，這就是她爸爸講的話，2018 年 11 月 24 日，那天就是國民黨大勝，她爸怎麼講？他說「國民黨是無孔不入全面滲透，國民黨很厲害，是沒有辦法被消滅的。」你們不知道她爸爸講這句話的時候有多恐懼，以及有多堅定告訴我這句話，他覺得是沒有希望的，不可能真正民主化，你可以知道為什麼他到現在都覺得特務還在監視他。這是小丰講的：「我摸他的手的時候，想起小時候也是那樣，他一激動，我就要跟他撒嬌，讓他覺得我很乖、很可愛」，那是唯一她能夠安慰他爸爸的方式。我想我就停在這裡，後面雖然還有很多東西，這是我的結論，就是大家可能以為療癒是一對一的、心理的，只是純粹處理心理狀態。可是對我來說，是政治社會的工程。當一個 60 年代的受難者，到今天都還相信國民黨還在監視他，我就算每天去看他，都不會有用的，必需要你們一起來，必須要這個社會上的人一起來，讓這些前輩相信，不要說國民黨消滅，至少國民黨改變它的性質，願意回來面對他們過去的事情。我們今天說：「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你覺得國民黨會改變嗎？我覺得這機會有點渺茫。但凡是願意來對話的人，我都願意對話。

我們一直說社會和解，可是我們一直期待的是受難者死光，國民黨期待的社會和解是受難者死光，以至於小丰跟我說，我們不要再談和解了，我們二代三代都不要生小孩，等我們都死光，你們就去和解吧。很重的話，可是那是多絕望的狀態？他們不相信有生之年會看到社會和解，他們覺得你們總是把社會和解的責任丟在我們身上，好像我們原諒國民黨，這件事情就可以結束。可是我們冷漠那麼久之後，我們的責任在哪裡？對我來講，我們真的要重新做社群的部署，又如何讓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價值被理解？我們要用群體的方式，把這些價值穩固下來，不是意義固定，要不斷對話，才有辦法讓實質的意義能夠被彰顯，我把它叫做「有機的療癒部署」，是牆內的也是牆外的，我們必須要一起來做這件事情。今天就講到這裡。

觀眾 D：謝謝老師的演講，我想對於這種政治暴力，我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沒有懲治這些施法者？我的看法是說，政府總統出來道歉，這些道歉的人基本上和這些施暴的人幾乎完全無關，這樣的道歉，他代表政府？代表誰？我覺得很懷疑，這種道歉是非常荒謬的。到現在促轉會為什麼不能懲治這些施暴者？我感覺非常疑惑，是抓不到這些確切的證據，還是基於我們認為臺灣要向前走，要維持和諧社會狀態，或是因為國民黨或軍方？我認為軍方、情資單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們還有背後勢力的存在，造成促轉會不敢這樣做。我提到相對的案

例就是說，智利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倒台以後，智利從事和解的工作，他們也有針對皮諾契特起訴他，可是皮諾契特有他背後軍方的力量在支持他。因此，雖然他有入獄，但只是坐爽的，因為有智利軍方的介入，所以我想問，為什麼台灣做不到？

觀眾 A：我想問剛剛提到的案例都是尚未療癒或沒有療癒的，有沒有一些案例是經過過程好起來的？

觀眾 E：我們現在走在很沈重的感覺。那個感覺是，這個療癒經過數十年，可能都還在匯集、進行中。我有個困惑，這邊提到「個人與集體的連結」，我的猜想就是，如果有些他是願意去做更裡面的議題工作，他在心理諮商的範圍試著重新理解、重新寬慰這個世界、重新為自己找到定位。但他如果在整個社會中，對他來講沒有訴求，會不會到最後他覺得，我努力做這個工作也沒有用？就像有些案例都是受到身心疾病的狀態，他可能透過很多我們既定的醫療，也努力在讓自己活得下去或活得好，問題是他要怎麼跟生物集體的部分做連結，才能讓整個事件重新詮釋？

觀眾 F：我的問題有點類似那位先生，因為從自己的學科課程看到現在，也知道政府很努力，有很多檔案、審判相關資料都公開，我們都已經看得到加害者的名字了。雖然和解很重要，但我們政府是不是沒有比較系統性處理加害者？只要上網就找得到他是誰，這些人都在上面，但我們一直還在處理受害者，陷在受害者的情緒中。我想知道後續促轉會針對這些有什麼規劃嗎？或就妳所知，我們的執政黨或政府有沒有要處理？我比較想知道政策面或在委員會裡面，你們有沒有設想要處理這些加害者，我都知道他是誰了，為什麼沒什麼動作？

彭仁郁：這個複雜的問題，加害者處理這邊。剛剛先生有提起，臺灣的政經結構，我們絕對是民主化的，但光是體系裡面，從 1949 年國民政府來台灣後，立刻在軍警、情治單位，甚至連教育裡面有所謂八大情治系統，所以是全部被監控。我們有準備資料庫，你只要查案件就可以知道他經過幾次審判的流程、是誰參與、誰是檢察官、誰是決定刑度的人，這些名字我們都可以看到。但現在很麻煩的事情是，大家可能不清楚促轉條例 2017 年通過時，他是一個框架的立法，他只有讓促轉會有規劃跟做初步調查，我們有申請檔案的權限，也可以為了要釐清某個案子去請當時的人出來，那些有可能是加害體制的人來做訪談。但那叫訪談，不叫審訊，我們有權限做這樣的工作，卻沒有司法權。光是我有準司法權，也就是我有準調查權，已經被現在的法務體系裡面的人們，包括司法官，是強力反對的。因為他們認為在民主憲政體制底下，不應該有司法單位以外的行政部門，行政部門是不可以擁有司法權的。

也就是說，在目前憲政體制下，我們面臨一個非常困難的處境。如果今天還是在民主化的最起初，比方說在李登輝總統 1996 年當選，擔任臺灣第一任民選總統的時刻，如果在那時候決定要有一個促轉會這樣的機構做調查跟司法體系，以這個促轉會代替司法，因為他們（按：應指國民黨）自己也要轉型，所以他自己也有正當性去做司法調查。但我們已經三十幾年民主化過程後，看起來憲政秩序已經穩定了，以至於在法律層面上，就會有所謂行政權跟司法權不能相互干涉的問題，不然就不是獨立的。我們的轉型正義的歷程跟其他國家非常不一樣，三十年的寧靜革命讓我們付出很高的代價，因此我們現在雖然有一個行政體系、是獨立機關，可是要去行使準司法權時會遭遇極大的反彈，甚至讓我們去承擔我們是違憲機關的罵名。違憲這件事，在司法官包括法務部裡的人，他們見解都是有衝突的，所以促轉會面臨一個政府內部問題。

我們講到做到社會信任，我們被賦予的權限只有調查之後的規劃權，不可能直接處罰他，因為處罰他要回歸司法體系。我們沒有權限去做處罰的動作，但我們有權限去做清查，我們把

每個階層做什麼樣的事情的情況釐清之後，這些事情要回歸到法務、司法的部分去做實際上的懲處，我們可以提出規劃，我們只有這樣的權限。所以你剛剛講的受害者咎責這部分，我們可以做的是清查、歷史真相的調查，以及如何處置的建議。大家如果仔細去看促轉條例就會知道我們沒有實際司法權限，我們當然會想辦法去做、克服種種困難。的確剛剛這位先生說的，軍方、國安單位，這個工作的困難就是要正面鼓勵這些單位，單位們如果願意跟你多配合的時候就是要鼓勵，如果我們在這邊講他們都不配合，其實他們就會真的不配合。為了讓他們配合，就想辦法盡量降低他們的戒心，讓他們理解我們要做什麼。

畢竟絕大部分在政府部門的工作的人，包括長官在內是沒有轉型正義的概念的，光是在做轉型正義的時候，其實公部門體系各個環節是要結合轉型正義教育的。但是我們可以知道，他們都說我們都懂，我們裡面講的民主、法治這個，現在司法是獨立的，再也不會發生以前的這種冤案，或者是酷刑逼供的狀況。可是如果去問一些司法改革的人，我們司法沒有做到無罪推論，冤案、被逼供的事情還是時有所聞。你會聽到所謂人權律師就會說，為什麼現在還有冤獄狀況，恰好是因為我們沒有做轉型正義，以至於檢調抓到人的時候就還是要他認罪，雖然比以前好，但沒有完全。要不要處罰？這需要社會討論。今天加害體制參與的是你不認識的人，當然你應該要負責，你做了什麼？可是我們現在碰到的狀況是，因為有司法鎮壓的系統，也有監控的系統，也就是說，一個人要從他被監控到送到司法的過程，其實很漫長，叫「養案」的過程。你今天不會是因為你發傳單就把你抓過來，你發傳單見了誰，我要有漫長的過程，光是一個人被審判，可能涉及到數十人、上百人，那每一個人的責任要怎麼去區分？非常複雜。我們不是複雜就不處理，我們要處理，只是促轉會在行政部門，我們是獨立機關，必須跟其他部會協調，協調過程當中，包括我們決定要怎麼去處置這個議題、怎麼去處理這個包括從監控開始的人？從警察、情治單位，到後來我怎樣去定他的罪，以及這個參與人在什麼樣情況下去執行。

我們曾經訪問過加害體制的參與者，成案跟臨案還有其他案子，我們都訪問過。很多人都不願意來，我們沒辦法強求，不願意來用的理由是健康理由，他的年齡已經八、九十歲，如果訪談他，讓他中間有什麼不測，我們要負責。我們一直被受到這樣的威脅，就算他願意來，他基本上都會說，我就是依法行政。常常看到特別是德國轉型正義的電影，你會看到他們都說：「我們就是執行命令。我可以不執行命令嗎？」其實這件事情臺灣社會沒有真正討論，如果你不執行命令，你是下一個被官方捨去的人，甚至是下一個被槍決的人。在這情況下，我們要怎麼去定這個人罪？我們可以說他要負責，可是他要負多少責任，怎麼負責？我們社會集體氛圍還沒進到這種積極的討論能力，這阻力是非常大的。不只社會大眾，我們跟機關協調的時候，阻力是非常大的，即便促轉會一開始就承擔非常大的政治風暴，這也完全弱化了我們在裡面的失誤的可能。一個禮拜前我們有新的組合，我相信今年接下來我們推動的速度會比較快，雖然我們不能直接做出懲處，可是我們怎麼樣去咎責的建議，我相信會很快，因為我們現在有四個法律專才在我們當中，請大家期待。

關於療癒的問題非常複雜，我不會說有「好」這種事。我們在做修復式轉型正義的時候，其實轉型正義全面的工程，它會有主體層次、法律制度、社會信任的層次。我要讓它的主體性可以被恢復，也就是讓人際信任可以被重建，讓整體的核心價值重新建立。在真相的建構方面，要透過一個名詞，好像我們真的可以重建歷史真相。當然，我們不可能重建歷史真相，有很多細節遺缺會被遺漏，這有很多缺，我們要怎麼面對這些缺？以及如果這些歷史真相有非常多的矛盾，讓某一個人，我們本來以為他是民族英雄，後來你發現他在某個狀況底下，他被迫要被轉換成線民……，在那情況底下，有多少當初曾經被這樣收編？其實只要問，如果在 70 年代你發了傳單，然後你被判二條三，要面對 15 年的刑責，特務告訴你說，如果你供出組織的人或幫我監視誰，那個人你跟他很熟，你可以無罪離開，可以回家照顧你的太太小

孩，此時此刻的你會怎麼做決定？我覺得，不管是受害者邊承受的創傷，或加害這邊做的應該要如何被釐清罪責、怎麼承擔罪責的時候，一定都要回到當初脈絡去。如果是我，你回去做你最好朋友的監視者，你本來要被判 15 年的刑責，如果你配合，你可以立刻回家去，晚上看到你家人，你要做的只是定期跟特務報告，你的朋友做了什麼，你會做什麼樣的選擇？你會大義凜然地說：「我不會出賣我朋友的，這事情我會扛下來的。」你會這麼做選擇嗎？基本上這就連結到關於加害體制。在國際刑事法庭上，台灣沒有國際地位，像是陳文成的家屬本來想要去國際刑事法庭告蔣經國，可是國際刑事法庭在處理這種大規模人權侵害事件的時候，他們有個很大原則，最高的指揮官要負全責，他們永遠都是從最高的指揮官開始審訊，就是所謂的加害指揮鏈，原則是確定的。指揮鏈上，你佔據越高的位置，表示你權力越大，應該要負最大的刑責，我相信這個原則是不會有人反對的。只是在台灣，我們現在政治氛圍底下，我們怎麼去做這件事情？大家不要忘了，臺灣在做轉型正義被看成是台獨勢力的，我們做轉型正義，他就說你搞臺獨，我們是不能去中國的，要做轉型正義是要付出代價的。

習近平不是一直宣示，建國一百年就要把我們當祭品？如果他打來了，你會重新進入白色恐怖的，像香港現在這樣，你會怎麼做選擇？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歷史時刻去回顧以前的歷史當中，去決定人在怎樣情況下怎樣做選擇。我當然知道促轉會也絕對地要去做這件事情，只是我們可以推進到什麼程度，其實以一個民主國家來講，如果人民不支持，我們的經費是人民在決定，是否能夠持續也是人民決定，我們做的每一步都是人民決定。我們講執政黨高層好了，昨天高雄就教我們一件事，現在就是人民當家，雖然很複雜，可是現在人民是有機會的。政治角力現在的情況絕對已經跟戒嚴時期不同了，但如果大部分的人都不管轉型正義在幹嘛，我們不可能有支撐的力量往前推進。如果人民不支持我們去反省國民黨做的事情，繼續把票投給果民黨，誰知道如果中共跟國民黨聯手，我們是不是下一個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我現在講的不是莫名的，這是我當初進促轉會時就有人提醒我，這不是單純的選擇。我沒有覺得自己很偉大，只是我就賭台灣人願不願意支持這件事情，療癒到底要做到什麼樣程度？的確當外在現實沒有辦法改變的時候，這些很破碎的主題，起碼在面對人際關係當中，要怎麼面對外在的不確定性？如果在一個人跟人的永恆關係當中，他的主體性被確立了，基本主體性能夠被修補起來，他對抗外面這個紛雜，是有能力去面對的，對我來講這已經是療癒很重要的轉換。

我剛講小丰的狀況，我認識她九年了，可是我到去年才有辦法進去她家。本來我以為無望了，但小丰狀況變好是因為我可以進到她家，我可以作為她跟她父親的橋樑。她很愛她父親，可是沒有辦法忍受在她父親身邊，因為我的在場可以讓她跟父親連結，這是非常重要的。她現在已經變成我們促轉會的志工，非常希望幫助我們建立受難家庭的各方面需求，幫助我們把跨專業模式做起來，用他們家當做例子，幫我們推動專責療癒的機構，因為每個家需求是不同的，有人家有精神症狀、有人經濟條件比較好、有人家在貧窮的邊緣。我們真的希望說，目前臺灣是沒有跨專業的，所謂的社安網是第一線社工撐著，可是也有真正的跨專業。這件事情有點複雜，但總之，為了要把跨專業的療癒建立起來，要越過現代的難關，除了在法規制度的設計上面我們要從零開始，當然我們會希望能夠盡快到家屬面前。可是，我們只有四個心理師，我們找得到判決的有一萬個家庭，要儘速把心理師機制建立起來，把資源串連起來，而現在我們已經在很小規模地推進了。我相信小丰是一個例子，我講過我們之間建立關係，雖然也有辦法在專職機構很密集的工作，可是其實這些人都已經開始跟我們建立關係，他已經在人際網絡裡面，如果今天他們掉下去，他們可以找誰，這樣初步的連結已經做起來，我們希望這個連結可以持續延展。今天就回答到這邊，謝謝大家。

(朱英韶整理；陳思含審閱)